

创造性的社会发生:兼论“仁且智”何以可能

刘 昌^{*}

〔摘 要〕 创造性本为人之天性,即人人皆有为社会提供创造性产品的可能性。如果某种创造性的产品能为社会所认可和共享,并产生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创造性的社会发生。本文从心理、社会和历史综合视野分析了创造性与道德存在正向关联的深层蕴含,提出了一个有关创造性的社会发生机制理论,认为创造性和道德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并论证儒家心中的理想人格——“仁且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达成最大程度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 创造性;道德;自由;社会脑风暴;仁且智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每一阶段,贯穿着对道德、知识和智慧的追求。除了自甘停滞的社会,对创造性的呼唤几乎成为每个时代的最强音。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群不存在根本的智力差异,然而,其彼此之间的创造性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别,其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在本人及其合作者的一项研究(刘昌、沈汪兵、罗劲,2014)中,我们曾通过认知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发现,创造性与道德存在正向关联。这一正向关联意味着什么?本文试图从心理、社会和历史综合视野探讨这一问题,并就中国传统的“仁且智”观进行剖析,提出一个有关创造性的社会发生机制理论,以解释创造性与道德的正向关联。

一、创造性是人类的本性

关于创造性,首先需要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创造性指的是一种心理品质和能力,按照一定的目的,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并能产生新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Sternberg & Lubart, 1996, pp. 677—688)。创造性既表现在物质领域,更表现在精神领域。物质领域的新器物和新技术的产生是一种创造(人们通常所说的“创新”主要指这方面);在精神领域,理论、思想、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出现也是一种创造。但如果将创造性的领域仅仅局限于此,无疑会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群排除在外,从而把创造仅视为极少数人的活动。事实上,没有同时代普通大众的创造性活动的参与,少数青史留名的创造者们要在其时代脱颖而出也是困难的。创造性活动不仅仅体现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艺术创作中,也同样体现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小创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发

^{*}心理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研究生贡喆和王贤协助查阅了部分文献资料,特此致谢。

现、日常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发现,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创造,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创造性活动过程通常伴随一系列复杂的情绪体验。在有关顿悟问题解决的心理研究中发现(Shen, Yuan, Liu & Luo, 2016, pp. 281—298),起初问题不能解决时表现为焦虑和失落,但最终问题解决时表现为一种兴奋和愉悦的体验。对于更复杂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其情绪体验当更强烈,如同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说“我找到了”时的心理状态,后世的心理学家卡尔·彪勒(Karl Bühler)将这种状态名之为“啊哈体验”(aha experience)。心理学家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曾采访在科学、艺术、商业等领域有所创新的近90名西方杰出人士(其中有1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之中有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作曲家、作家、艺术家等,基于访谈和观察发现,这些人物经常经历一种愉悦的体验。米哈伊称之为创造性的“涌流”(flow)。这种创造性的涌流状态,相比其他心理活动而言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1)每一步都有明确的目标;(2)摒弃杂念;(3)想不到失败;(4)自我意识消失,觉得自己与周围融为一体;(5)忘记时间的存在,或者时间感被歪曲”(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2001,第106—125页),等等。

总体上,创造性的涌流状态的最大特点就是忘我,这是一种心灵在高度专注下的自由探索。在这种忘我、专注且自由的状态下,心灵的创造性自然如泉水般涌流出来。历史上的创造性人物其创造性活动大都经历过这种忘我、专注且自由的心灵涌流状态。不独如此,几乎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心灵涌流状态,这种状态恰如每个人在儿童时期所进行的游戏活动。

儿童的游戏活动是儿童对世界的一种自由探索和求知,是儿童精神世界的生动展现。在这里,天然的好奇心驱使着儿童的游戏活动,也同时强化了儿童的好奇心,丰富了儿童的想象力。儿童的游戏给儿童提供了精神的滋养,成为成年后有关童年记忆中最难忘怀的一幕。儿童的游戏令人信服地证明,“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1959,第1页),并且,自由也同样是人类的本性。“人本自由”(亚里士多德,1959,第5页),在自由的求知状态下,创造性的涌流自然就会出现。如果说自由和求知皆为人类的本性,那么,创造性理所当然也是人类的本性。

二、社会脑风暴

说创造性是人类的本性,指的是人人皆有为社会提供创造性产品的可能性。如果某种创造性的产品能为社会所认可和共享,并产生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创造性的社会发生。创造性作为人之本性,为创造性的社会发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种子”。然而,创造性的“种子”只有在适宜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社会环境的不同,必然导致创造性的社会发生效果不同。良好的社会环境必然源源不断地产生有社会价值的创造性产品;不良的社会环境使创造性的“种子”难以生根发芽,甚至扼杀创造性的“种子”,无法产生有社会价值的创造性产品,使创造性的社会发生无法实现。

因此,创造性的社会发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社会环境。那么,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创造性的社会发生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这里,笔者提出“社会脑风暴”(social brainstorming)一词,试图解释创造性的社会发生的作用机制。

在组织群体决策中,有所谓“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系美国创造学家亚历克斯·奥斯本(Alex Faickney Osborn)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它指的是,在一个一般不超过10人的群体中,针对某个问题,鼓励群体成员自由思考,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且急于评判他人,待头脑风暴结束后再评估群体各成员提出的想法。这是一种相互之间的脑力激荡,目的是为了保证群体决策的创造性,提高决策质量。

“社会脑风暴”(social brainstorming)一词只是借用了“脑风暴”概念,其所指和内涵与“脑风暴”

完全不同。“社会脑风暴”指,在一个国家层面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并能自由地开展对话、批评和交流,如此情况下社会个体彼此之间进行充分的脑力激荡,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性活力。历史上,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地球的东西方分别出现过各自的“社会脑风暴”,其在中国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在西方则发生在古希腊时代。这一时代被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

具体而言,中国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至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为止的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学者,围绕人性、天道、家国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如儒家(代表人物有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子贡、子游、子夏等,其后的孟子、荀子等)、墨家(代表人物有墨子、禽滑釐、腹䵍、孟胜等)、道家(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文子、列子、杨朱、环渊等)、法家(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田骈、韩非、申不害、李斯等)、名家(代表人物有邓析、尹文、公孙龙、惠施等)、兵家(代表人物有孙武、司马穰苴、孙臧、吴起、尉繚等)、医家(代表人物有扁鹊)、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纵横家(代表人物有鬼谷子及其弟子苏秦、张仪)、阴阳家(代表人物有邹衍、邹奭)、杂家(代表人物有吕不韦),等等。发生在这一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究其实质则是一场时间长达500多年的“社会脑风暴”。这场“社会脑风暴”激发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创造性活力,为后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即创造性产品),且波及至今。

差不多与中国春秋战国同一时期,在地中海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屿及东岸的小亚细亚西部沿海一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间陆续涌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戈拉、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怀着对学术的炽热迷恋,兴办学园或学院(如柏拉图建立了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院),运用理性的抽象思维探讨万物的本原、宇宙演化、逻各斯、努斯(灵魂)以及国家治理等问题,其“社会脑风暴”的产品——古希腊哲学——构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理性智慧之源。

同一时代分别在东、西方进行的“社会脑风暴”,因表面上不同的原因最后都终止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出现,源于周室王权的衰落以及与此同时各诸侯国的激烈竞争。当时,周室王官流落民间,私学勃兴,“士”(读书人)阶层开始活跃,各诸侯国竞相罗致人才,甚至建立学宫(如齐国建立了官办的稷下学宫),社会养士之风盛行,“士”可以在各诸侯国之间自由流动,著书立说,儒、道、墨、法等各家相继并行。作为“社会脑风暴”的产物,法家思想却要求禁止言论自由,其强国主张被秦国采纳后,在经济上速见成效地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当秦始皇灭六国完成了制度大一统(公元前221年)后,继续以法术治国,期传万世,孰料立朝仅十五载而亡。汉继秦而兴,初期一度倡导道家的黄老之术,但儒家、法家、阴阳家等依旧承春秋战国时余波(墨家在战国后期已受重创),后董仲舒援法入儒,将儒学法家化(余英时,2004,第181—195页),向汉武帝上书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公元前134年),完成了学术大一统(李零,2016,第62—66页),至此,始于春秋时期的“社会脑风暴”落下帷幕。

作为世界思想宝库中最伟大的创造性产品之一,古希腊哲学产生于自由和闲暇,自由和闲暇为“社会脑风暴”提供了保证。在其一千多年的演变历程中,从初期追问“是什么”,到中期追问“为什么”,再到晚期转向“为了什么”,体现的是哲学思考从求真转向求善、最后走向宗教信仰的过程。

古希腊哲学自泰勒斯开始,最初对外在的自然感兴趣(自然哲学),其关注的中心主要在万物的本原(“是什么”)。随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以希波战争的胜利为标志,古希腊哲学进入繁荣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先后出现,意味着古希腊哲学渐臻于极致。此间古希腊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已经转向“灵魂”、“美德”诸问题(“为什么”),最终以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哲学体系为标志。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伴随着马其顿对希腊的控制(公元前338年)、以及罗马对

希腊的控制(公元前146年),古希腊哲学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希腊城邦公民主体性丧失,古希腊人的生活由恐惧代替了希望。在其后漫长的八百多年中,古希腊哲学关注的是如何拯救自己(“为了什么”),试图解决人生追求问题、幸福和快乐问题、个体灵魂的平静和升华问题,等等。这种以伦理学为核心的处世哲学,预示着古希腊哲学走向宗教的必然性。到了公元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解散雅典学园,基督教最终取代希腊哲学(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2010,第57—69页)。

从以上分析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自由是“社会脑风暴”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前提。当自由不再存在,“社会脑风暴”将随时面临终止。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法律保障下的现实中的有序自由(刘军宁,2014,第217页)。所谓法律保障下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是法律保障的,而不是来自口头上的;所谓现实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是当下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而不仅仅是写在法律条文中的;所谓有序自由,就是行使自由的公民必须具备相应的内在道德修养,即公民应具有自我约束的美德,自由也同样与秩序和美德紧密相连。

自由之所以能够促进创造性的社会发生,首先在于,自由保证了社会中的个体能心无旁骛地从事创造性活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资源总是有限的。自由意味着免于外部的约束(压力)。当外部约束持续存在,当个体由于外部压力干扰处于分心状态时,有限的心理资源被大量占用,余下的心理资源通常不足以用于创造性活动,或者无暇从事创造性活动。自由个体的不断加入使“社会脑风暴”扩大并持续,没有自由个体的不断加入,“社会脑风暴”将逐渐萎缩并消失。在持续的“社会脑风暴”状态下,创造性的社会发生将不再依赖特定的个体。譬如,假如没有牛顿,同样会有另外某个人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由此可见,比开发和培养个体创造性的各种教学技能更重要的是如何提供和营造一个创造性的自由环境,因为创造性本为人之天性,只要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在个体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和某些相应条件下,创造性的社会发生自然得以实现。

自由之所以能够促进创造性的社会发生,还在于,保障自由的社会制度同时保障了社会公正,从而增进了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的增进,会简化社会治理的各种复杂性,促进社会个体的交流(也促进和扩大了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脑风暴”),极大地降低社会运行的各种成本,能将有限的社会资源更多地用于社会发展,自然也就保障社会个体有更多的闲暇用于创造性活动。在这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下,社会道德的提升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正义、信任、甚至创造性也将成为全社会普遍追求的美德。因此,所谓良好的社会环境,即是指保障自由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社会脑风暴”才能产生、壮大并持续,才能出现一个充满创造性的社会,也同时会出现一个拥有较高道德水准的社会。

三、“仁且智”何以可能?

关于创造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我国古代思想家通常表述为“仁”与“智”的关系问题。在《论语》中,“仁”与“知”(即“智”)常常同时出现,成为孔子心中之追求,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第四》,朱熹,1983,第69页),“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第六》,朱熹,1983,第90页)“知者不惑,仁者不忧”(《论语·子罕第九》,朱熹,1983,第116页),等等。孟子借孔子弟子子贡之口更是总结为“仁且智”。《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载了这段话: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及而教不倦也。”子

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朱熹,1983,第233页)

这段话的大意是,子贡问孔子,“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做不到,我不过是学而不知足,教而不知倦罢了。”于是子贡便说,“学而不知足,这是智;教而不知倦,这是仁。既仁且智,老师已

经是圣人了。”子贡对老师给予了高度赞美。孔子之所以是圣人，子贡的依据就是“仁且智”。

关于“仁”，著名的论断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朱熹，1983，第298页）。仁，既是人内在的道德情感，又是人之行为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规范。关于“智”，子贡认为“学不厌”是“智”。那么，该如何理解“学不厌”？《论语·述而》已有同样的话，“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朱熹，1983，第93页）对此，李泽厚先生（2004，第190页）的解释是，“学为什么能不厌？因学非手段，乃目的自身，此学即修身也。”此解甚佳。只有在为学而学之时，学能致乐，才能达到学而不厌的境界。当学之中突然获得自己的领悟、自己的见解时，快乐必然如泉水涌出，这正是一种“我找到了”时的“啊哈体验”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创造性的涌流状态。因此，“学不厌”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过程。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谈论的“知”或“智”，广义而言是一种认识能力（心理学的智力活动范畴），具体而言则是一种洞察能力（即智力活动中的更杰出表现），体现为创造性活动。

“仁”属于道德实践领域，“智”属于认知活动领域。因此，对于社会中不同的个体，“仁”与“智”两方面的结合必然表现为多种之不同。汉代的董仲舒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猥给，则迷而乘良马也。……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苏舆，1992，第257页）

按照董仲舒的观点，仁与智都同等重要。不仁如同“狂而操利兵”，不智如同“迷而乘良马”，都会产生不同形式的危害。因此，只有“必仁且智”，仁智统一，才能使人格臻于完善。

关于“仁且智”，当代研究者们普遍将其视之为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杨海文，2000），这固然不错，却无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问题在于，儒家如此强调“仁且智”，其理想代表人物如尧、舜、周公、孔子等人在后世被提到圣人的高度而受到顶礼膜拜，为什么后世能达到者寥寥？《孟子·告子章句下》甚至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朱熹，1983，第339页），孟子基于其“性善论”肯定了这一命题，然而，孟子之后的几千年中国历史并没有证明该命题的成立，仁而不智、智而不仁、或不仁不智之人似乎俯拾皆是，这让儒家情何以堪？自古及今，儒家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采用榜样示范的力量昭示后人，但几千年来成效甚微。儒家之所以未能使社会上大多数人做到像尧、舜、周公、孔子那样的“仁且智”人格境界，关键在于儒家建立了一套无效的国家治理方案。儒家试图将治国平天下的目标立足于个人修身的基础上，这完全是儒家的臆想。《大学》中有这样一段话：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1983，第3—4页）

在儒家的这篇核心经典著作中，儒家提出了一套从个人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和平天下的家国治理路线。但是，从个人的修身到治国平天下并无内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也许这样一套治理方案适合小国寡民时代（这大概是儒家总是将尧舜视为治理天下的政治和道德楷模的原因），但孔子以后的历朝各代并未证明这一套治理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治国平天下的标志是国家富强，国家之富强的根本在于社会强大的创造性活力。从前文的分析已知，正是自由，使创造性（“智”）和道德（“仁”）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创造性和道德是自由之树上必然会结出的果实。所以，只有在保障自由的社会制度下，普通的社会个体才有望达到“仁且智”之人格境界。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皆可以为尧舜”才有望达到最大程度之实现的可能，儒家提出的“仁且智”之理想人物尧、舜、周公、孔子等将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供人崇拜的偶像。

董仲舒之后,北宋司马光通过对春秋末期“三家分晋”之史实的评述,从治国的高度对“德”与“才”之关系做了深刻分析,这实际上是有关“仁”与“智”关系论述的进一步展开: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2012,第13—15页)

在司马光看来,对于国家治理,如果找不到“德才全尽”的圣人和“德胜才”的君子,那么,宁愿使用“德才兼亡”的愚人,也不能使用“才胜德”的小人,因为自古以来,导致国家覆亡的多是才有馀而德不足的乱臣败子。也就是说,德才皆备当然好,但在德才不可兼得时,应首先重“德”。这是中国历朝各代用人所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问题在于,要在用人实践中准确观测一个人的“德”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即便采用了这条用人原则,中国历朝国祚并未因此更长久。或亡于内乱,或亡于外患,历朝之结局大抵如是。

显然,历代王朝兴亡的根本就不在用人的“德”与“才”之取舍上,其根本仍在于自由。在中国历史上,繁荣中兴的时代,通常有相对较多的自由,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反,腐朽衰败的时代,通常缺乏自由。唯有自由之存在,社会才有活力,社会财富才会持续增加,人才方能兴盛,“德才兼备”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普遍存在。当此之时,儒家将会发现,困扰治国平天下的用人之“德”与“才”的取舍问题早已经不成其为问题。

四、以善致真

至此,自由作为创造性的基础,已从心理、社会和历史的综合视野得到了充分论证。自由促成了“社会脑风暴”,进而使创造性的社会发生得以实现。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创造性的社会。而且,自由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充满了信任的社会,最终必然提升了社会的道德水准。可以说,创造性和道德是自由的必然结果。

当然,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脑风暴”,有可能产生终结自由的“种子”。譬如,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脑风暴”的产物,法家却要求禁止言论自由,并最终为秦始皇采纳。正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的法家,古希腊哲学自身似乎也产生了终结自由的“种子”,这主要是源于柏拉图提出的古典美德观。在柏拉图看来,个人的美德在于要与城邦的整体利益紧密结合,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柏拉图,1986,第133页)

在这里,正义的原则就是“每个人就各自有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1993,第777页),个人的幸福由他对城邦所承担的责任大小来衡量。这是一种高调的理想主义的美德观,正如刘军宁先生(1998,第353—358页)所说,“它赋予国家以巨大的道德权威和道德使命,把美德当作是治人的重要工具……毫不奇怪的是,这种美德登峰造极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代。”

因此,自由是建立在相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自由。唯有自由,儒家心中的理想人格——“仁且智”,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普遍存在。如果说,自由是“善”,那么,创造性就是“真”,善可致真。在自由的社会,创造性将成为社会上多数人的追求,此时创造性已变成一种社会美德,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真善美的社会。

参考文献:

- [古希腊]柏拉图,1986:《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零,2016:《茫茫禹迹》,《我们的中国》(第1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李泽厚,2004:《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刘昌、沈汪兵、罗劲,2014:《创造性与道德的正向关联: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刘军宁,1998:《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刘军宁,2014:《保守主义》(第3版),北京:东方出版社。
- [美]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2001:《创造性——发现和发明的心理学》,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司马光,2012:《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 苏舆,1992:《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
-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1993:《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2010:《希腊哲学史》(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1959:《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海文,2000:《“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孔子研究》第4期。
- 余英时,2004:《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朱熹,1983:《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 Shen, W., Y. Yuan, C. Liu & J. Luo, 2016, “In search of the ‘Aha!’ experience: Elucidating the emotionality of insight problem-solving”,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107, pp. 281—298.
- Sternberg, R. J. & T. I. Lubart, 1996, “Investing in crea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1, pp. 677—688.

(责任编辑:蒋永华)

Social Occurrence of Creativity: How Can “Benevolence and Wisdom” Be Achieved?

LIU Chang

Abstract: Creativity is human nature, that is, everyone has the possibility of providing creative products for his community. If a creative product can be accepted and shared by the whole society, and produce social productivity, then it can be called social occurrence of creativity. From the comprehensive view of psychology, society and history and by analyzing the deep implication of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creativity and morality, I put forward a theory of the mechanism for social occurrence of creativity in this paper. The core views of the theory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 creativity and morality are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liberty; only with liberty is it possible for the ideal personality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 (i.e. possessing “both benevolence and wisdom”) to achieve a universal social reality.

Key words: creativity; morality; liberty; social brainstorming; benevolence and wisdom